

復路に変わったのです。21世紀ほど人が人を殺した時代はなく、人間の何たるかの極限形態を示したのです。現代中国論は、そうした人類史的規模の中で考えたいと思います。現存の「国家」を前提にした学問区分は、学問にならないのではないのでしょうか。

大学院時代に私と一緒に長く学んだ女性に、加々美先生の論文を読んでもらったところ、「どうも欧米人の学問書、学説書を表層的にあまりにありがたがって勉強しすぎ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難解な横文字が空虚に宙に浮く感あり」、「もう少し日本人の歴史や文化、現代社会における矛盾の基層から発する問題意識を踏まえた自己の言葉や概念に基づく発想ができないだろうか」などと言っていました。私も賛成するところがあります。我々は「無」から普遍的学理、新しいパラダイムを世界に発信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中国人の「現代中国学」と日本人のそれとは、同じものになるとは思いません。日本人が発する学問の課題、思考の枠組み、概念や理論は、日本人の学問的蓄積、独自の発想から提起され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例えば、私は学生時代に梅棹忠夫が「文明の生態史観序説」を発表しまして、大変感激しました。中尾佐助・佐々木高明の「照葉樹林文化論」、また梅棹忠夫の説を批判的に継承した川勝平太の「文明の海洋史論」、私が日本の哲学者で偉大な人だと思っている梅原猛の仏教史論、縄文文化論、アイヌ論などからなる「日本学・東洋学」、そのような蓄積から発する学問的射程の中で「現代中国研究」ができないだろうかと思うのです。簡単な現状分析の「現代中国学」ではなく、深い文化文明の堆積した歴史的地層の中から「現代中国学」ができないのでしょうか。では、「おまえがやればいけ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言われますと、なかなかで

きないから、このようなところで発言するにとどまるわけですが、何かそのような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だろうかと感じます。

私の具体的な提案は、お恥ずかしい限りですが、お手元のパンフレット（本報告書259～264ページ）に書きました（A）（B）（C）（D）くらいのことを考えているだけですが。以上、大ざっぱな問題提起に代えさせていただくということで、中途半端ですが終わりにしたいと思います。失礼致しました。

●—司会 次のコメンテーターは、南開大学の江沛先生です。先生は先月末まで、本学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の訪問教授として滞在されておりました。今回は、シンポジウム出席のため、急遽、再来日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それではお願いします。

●—江沛 前面很多学者做了精彩的发言，到我这里已经越来越难讲了。我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我还是要从自己研究历史的角度上谈谈对加加美老师论文学习的体会。

第一点想法，中国学需要共同态度性。正像加加美教授讲的那样，11世纪以后形成的欧洲汉学，重点在于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研究上，在1940年代以后兴起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它实际上关注的是中国社会怎样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这样一个过程，重点是在这个方面，因此，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我们首先应考虑一下中国人对这个过程是怎样看的。中国近代是在西方的炮火下展开了转型的过程，一方面我们要打倒西方的统治，进而获得民族的独立，这是一个根本的宗旨，后来也形成了中国社会反帝（即反对外来侵略）这一历史性的主题；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在被西方列强打开大门以后，开始逐步接受了现代性的思想，因此很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很难产生这种现代性，必须要学习西方，这就出现

了另一个历史性的主题——反封建主义。但这两个主题在内在逻辑上恰恰有一些矛盾之处：中国既要反对代表着现代性的西方的侵略，又要学习代表着现代性的西方现代文明。所以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两种思潮，一个是民族主义的思潮，另一个是自由主义的思潮，这两种思潮的交织，使得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发展走向问题上百余年来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争论，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趋势，是近代中国必须要走的道路，所以要学西方；而代表着现代性的西方，恰恰又侵略了中国，为恢复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又必须打倒西方列强。这一矛盾使得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了极大的问题，产生了诸多的悖论。这一矛盾与意识形态和民族情感等因素纠缠在一起，使得中国人难以理性地看待中国社会的本质、走向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and 角色，所以中国人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及研究，虽然不一定必以救国为归属，但中国人的思路更多地是停留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中国从近代以来形成了很多思潮，比如“科学救国”、“体育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但是我们很少有以价值理性层面为指归的“民主救国”或“自由救国”。中国知识群体自古以来形成的入世价值观，在民族危机的压力下，常常转换为对知识群体立场和研究方法的潜在影响。所以中国人的中国研究，也像加加美先生讲的那样，难逃地域研究的性质。甚至在1949年以后，对中国文化这种批判性的研究越来越少，思想界的同一性和均质性日益增加，在强调中国立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我们本身很多的研究走向了误区。西方包括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也存在一个目的性，究竟研究中国干什么？其实加加美先生讲得很清楚，是以国策研究为根本的。这种国策性研究究竟是愿意看到中国的发展，还是要遏制中国，这里面的因素就很复杂了。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研究再

次形成热潮，很显然是由于中国经济奇迹所引发的全球性关注，但是各个国家对中国的研究是不是也有保护自身利益以及政治需求的因素在里面，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复杂的问题。在今天的世界上，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指归的价值观是普遍存在的。科学的价值观是强调价值中立，两者间本身就有很多的矛盾，如果说是基于不同需求的国策研究性质的中国研究，结论肯定是有差异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因此，我个人对于加加美先生倡导中国学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用了一个题目就是“何以成为可能”。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在某些问题上能够找到共同的态度性，对促进中国学研究的客观性是非常有益的，当然这个路还会很长，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第二点，关于方法论。我们现在在批判东方主义，大家都认为它没有从中国或者远东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中国及远东，这是相当有道理的。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今天的学术体系都是来自西方，也就是说中国人，或者说所谓的地域内的很多的国家，在科学、教育各个方面仍然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即对西方的学习过程中，事实上既没有条件也没有基础创立一个超越西方的学术体系，或者说是有别于西方的学术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东方主义也是大家的一个无奈的选择，是一种不自觉的自上而下的文化关怀意识。其二，我们现在要思考一些国家、民族发展的重大问题，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如果现在不以西方为中心的所谓的现代标准展开，那么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看待问题，对于这一点考虑得还不够清楚。现代中国学本身是基于一个社会科学理论进行抽象的学术概念，当然应该是一个多角度的研究，多学科切入。哈佛大学的入江昭教授提出了“全球史”的研究方法，我个人认为是值得关注的。他特别强调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强调的是对不同文

化形态の尊重，当然他也强调要放弃西方的立场。这样一种类似的思考对于补充和丰富中国学，避免东方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弊端，我认为是有参考价值的。

第三点，中国的主体性是什么？其实中国的主体性非常复杂，中国有13亿人，有不同的阶层，可能对某一个具体问题存在很多不同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主体，怎样去理解？如果仅仅从现代性的一般意义上去考察中国的话，是难以充分地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也难以理解很多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中国有很多问题，经济的、人权的、政治制度、社会差异甚至生态环境等等，但是它与西方社会的诸多问题相比，存在着很多相异的渊源和特性。在这些问题的思考上，中国主体性的复杂性应该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我个人认为，在近代以后，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多数人都明白中国应该进入世界体系，以现代经济及普世的价值观改造中国，这样一个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怎样去具体地认知以及如何地改造？这样的一种思考可能就不一样了，因为考虑的角度及群体利益也不一样。那么这种多个主体性间的差异及融合，需要很长的时间，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的主体性之间的融合的过程恐怕要更加漫长。有人认为中国现在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在本质上并不是什么新的发展模式，今天中国的发展成就，只是基于西方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取得的。无论是技术上、经济体系上还是生活方式上，都没有有别于世界潮流的全新创造，所以应该讲，是世界正在从本质上改变中国，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并不是本质的。以上是我的一些粗浅的想法，谢谢大家！

●—司会 それでは最後のコメントター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資源研究所の宋献方先生です。お願いします。

●—宋献方 我是现代中国学研究一个外行，也是台上就座的唯一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去详细地来念我提供的材料了，我在材料里面讲了两个问题。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有幸参加了爱知大学COE第一期项目环境组的将近五年的活动。加加美先生以一位中国政治学家来提的现代中国学的方法论，我深受教育，体会很多。第一个问题是我查了一下我们中国国内对中国学的定义，以及中国国内的中国学研究的现状。在这些内容里面，我想要解释的是，国内的广义的中国学的定义好像和加加美先生在爱知大学倡导的现代中国学的研究范围基本接近，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学问，而且包括自然科学。我们在看加加美先生倡导的第一期的研究项目里，已经提出了文、理的问题。现在在中国国内，已经在中国社科院、中国很多的著名的大学成立起了中国学研究中心，而且从2004年每两年一届专门召开中国学的研究大会。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中国国内对中国学怎样定义、怎么研究。第二个问题，我谈的标题是现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讲这个问题，我想爱知大学COE的这个项目——现代中国学研究，进行了第一期，为了第二期加加美先生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论。我们研究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学肯定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把这个研究对象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首先爱知大学在日本国内要回答研究中国到底能给日本人民带来什么利益，如果这个问题不回答清楚的话，可能日本政府包括民间团体不会给你资助，我认为做任何时期它都有目的性，没有目的性的话任何事情都干不成。包括加加美教授回忆的这个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包括我在文章中讲的中国国内定义的中国学已有400年的历史，它的发展过程也都是很多西方为了殖民主义也好，为了国策研究也好，等等，都有目的性。没有鲜明的目的性